

- 17
- 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维护统一战线的成绩
 - 回忆为武汉一七二〇一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 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始末
 - 回忆我的青少年时期
 - 匪窟一百天
 - 我的贩毒生涯
 - 我与江青
 - 说不尽的张学良
 - 回忆张体学省长的一次「微服私访」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九年第一辑(总第五十八辑)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湖 北 文 史 资 料

一九九九年第一辑

(总第五十八辑)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EB07/29

湖 北 文 史 资 料 (季刊)

1999 年第 1 辑 (总第 58 辑)

主办: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 《湖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 湖北省政协印制室

发行: 《湖北文史资料》发行部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 1999 年 2 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字数: 12.6 千字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6-3285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067/K

定价: 6.50 元

目 录

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1)
--------------------	--------

时 代 追 踪

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 维护统一战线的业绩	宋 堃(5)
回忆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陈丕显(19)

沧 桑 看 云

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始末	吴子勋(25)
中南民族学院创建纪实	张瑞敏(43)

名 家 谈 往

攀峰与穿雾(连载之二)	刘西尧(56)
回忆我的青少年时期	刘仁静(70)

江 汉 寻 梦

武汉之忆	殷振家(79)
匪窟一百天	李昌国(83)
我的贩毒生涯	唐其发(90)

史林探奇

- 我与江青..... 徐明清(104)
我国报刊史上的一个谜..... 尚 丁(118)

闻人聚焦

- 说不尽的张学良(连载)..... 王朝柱(122)
回忆张体学省长的一次“微服私访”..... 冯朝义(143)
大汉奸周佛海在死前的日子里..... 孙晓鸥(146)

灯下说艺

- 文史资料工作的诞生..... 荆 楚(155)

周恩来

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的讲话

这是个别开生面的会，只请了年满60岁的政协委员参加。陈毅和彭真两位副主席例外，他们是“候补老人”。我也只有到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过60岁。陈毅同志喜欢用《秋江》里的一句台词，说过了60岁又是一个新花甲。老道理新解，很好。

这几天我参加了政协分组会，见大家精神很饱满，在新中国大家都获得了新生。现在60岁以上的委员有383人，占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还多。老年人占的比例很大也证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了。老年人得到了新生是可喜的事，但也要辩证地看问题。按照自然规律，人满了60岁，今后的日子总是比中青年人少一点了。有些人不服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有时熬夜多了就会出点小毛病。陈叔老（按：即陈叔通）也不服老，最近得了流行性感冒以后，才说服老了。老年人不能和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比，但要做到人老精神不老。据说过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40岁。现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也比旧社会好得多，大家精神愉快，长寿的人也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在新社会多活几年，多做事，即使多看几年也是好的。

在分组会上听了几位老先生的发言，很有感触，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安排的问题，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从已故的程砚秋同志那里得到的启示，程砚秋同志的艺术修养很高，解放后在政治上和作

风上也有很大进步,但总还是有点孤僻。在旧社会,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自好的习气,不大收徒弟,因此他的唱腔也就流传不广。解放以后,我曾劝他收徒弟。今年纪念他逝世一周年时,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他就去世了,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

在座的委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具体工作岗位的,担任着科学、医药、工程、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这部分同志很忙,有的连写东西的时间也没有。老舍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高龄的委员精力集中使用,工作的年头可以更长一些。到各地视察既是政协委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要量力而行,有的可以不去,也可以就近视察。这次张文白先生提出在北京附近视察,我们就赞成。以后,可以把老年人组织在一起视察,少看多休息,不能和年轻人一样对待。另一种是年老体弱没有具体工作岗位的,但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过去这方面的工作组织得不好,没能使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许多人在历史、科技、文化、艺术或其他方面是有研究的,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带徒弟写点东西。

我们都是过60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4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1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五四运动距今才40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现在当然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

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现在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是农奴制,再过几年也要改革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对袁世凯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顾颉刚先生说他想做些考据,但是政治运动很多,虽然有所得,却把时间都占了,在考据方面的贡献就少了。做考据工作只靠个人不行,要组织起来,也可以带点徒弟。

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

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做这项工作。在具体做法上要从容一点,不要像青年人那样,喜欢放“卫星”,也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有精力的时候可以多做些。收集史料的工作一定要从容一点。

昨天有两个黄埔军校的朋友讲起“三二〇”事变和皖南事变，听起来很有味，但我因有事只听了一个半小时就告辞了。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三二〇”事变的情况就可以补充已有史料的不足。他们说，在事变发生前一星期蒋介石想走。乍一听不容易理解，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向共产党的进攻，怎么他又想跑走呢？青年人听了根本不会相信，但根据蒋介石一贯的作风来看，这是可能的。蒋介石在陈炯明、孙中山手下时都曾拂袖而去。在黄埔军校时他同苏联顾问闹翻了，也是走了又请回来的。他当权后，这种事又有过三次：1927年下野去日本，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躲回奉化，1949年和平谈判时退居幕后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三二〇”事变前他可能想走，等到摸清我们毫无戒备的时候，就大举进攻。历史是曲折的。我早说过蒋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蒋介石这一集团是很有些东西可写的，在座的不少人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梁思成先生没有来，康同璧先生来了，他们二位如果对维新派有兴趣也可以写。去年学术界对戊戌变法作了评价，也还可以重新估量。国外有专门研究戊戌变法的，但我国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现在先提一提这件事，大家好作安排，具体的组织工作由政协常委会秘书处与各方面联系。

上面这些话可能对60岁以上的人有些用，所以耽误大家不少时间。

（1959年4月29日）

宋 堃

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维护统一战线的业绩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就受到了猛烈冲击，陷入一片混乱。周恩来总理在关注稳定整个局势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和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尽一切可能保护民主党派和党外知名人士。

早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江青等人就向中央统战部发动突然袭击，围攻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声言要炮打中央统战部司令部。他们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的伟大成绩，诬蔑全国统战、民族、宗教等部门执行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随之，中央统战部也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其后，随着全国混乱局势的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越来越遭到破坏。

1966年9月，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并指示徐冰等负责人：共产党员要坚守岗位，在任何时候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们受到揪斗，也要把民主人士保护好。与此同时，在红卫兵“造反”，勒令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及有关人民团体宣布解散时，周总理得知情况后，立即加以制止。并指示：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等可以先停止办公和活动，但决不能宣布解散，任何人也没有这个权利。周总理这个非常明智的处理，为人民政协、民主党派

在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活动和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文革”中，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受到了强烈冲击。周总理在艰难处境中，苦心保护了党内和党外的许多负责干部及文化、教育、科技专家。特别是他保护党外人士的事例，感人至深，不胜枚举。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章士钊、张治中、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华罗庚、李宗仁、马寅初、邓宝珊、朱学范、屈武等，无不受到他的直接的关怀、照顾和保护。尤其是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主席接到章士钊讲他被红卫兵抄家的信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为此，周总理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同时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要求对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人士，对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均予以保护。名单开列后，他又嘱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交给统战部照名单划定的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9月1日，他又命301医院准备接收张治中、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邵力子等入院，告以这些人士年老多病，政府应负责保护。

这其中，我亲身接触到的是周总理对著名爱国人士李宗仁先生的保护。当时，有关单位的群众要到李宗仁先生家中批斗，北京市公安局将此情况告我。周总理在得知此情况后当即指示：不能进到李宗仁家里去，不能在李宗仁家里搞斗争。以后，周总理亲自安排，由国务院管理局高富有同志接李宗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

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与李宗仁先生进行了亲切交谈。毛主席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这是毛泽东主席在“文革”开始后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处境最困难的时刻所作的最早的也是最明确的指示。周总理此刻也同聚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民主人士一一

握手、致意。周总理还特地握着李宗仁的手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301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这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太懂得党的政策，你可能会受到他们的干扰。当时，周总理曾通知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在国庆观礼后，把党外人士留下，和他们谈一谈，讲明党的政策，后因故未能谈成。尽管如此，党外人士完全能体会到周总理的关心和爱护。

1969年1月下旬，李宗仁先生病危，经我们建议，统战部军代表立即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指示：尽一切可能抢救。李先生病逝后，周总理亲自修改和批准了李先生的治丧报告，对主持骨灰安放仪式的人选作了调整，指示报纸即发讣告和照片，同时香港报纸也要发消息。此件并经毛主席审阅同意。2月初，周总理主持了李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那天早上，天气灰蒙蒙的，刮着凛冽的寒风。面色肃穆的周总理冒着严寒，身穿呢子大衣，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李宗仁骨灰安放仪式的还有章士钊、张治中、罗青长、程思远、刘仲容等人。周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关切地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当时在北京外语学院任副院长的刘仲容，穿着一身旧棉衣裤，面容憔悴，他正被红卫兵“专政”。周总理知道了这个情况，回去便和有关单位打了招呼，改善了刘的处境。

周总理亲自主持李宗仁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当时来说，已是很高的礼遇了。程思远先生当场向周总理递交了李先生生前留下的一封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信。这封信是李先生在弥留之际，由他口授别人代笔的。信中主要表达他回国后受到党和政府礼遇的谢意，他认为自己回国这条路是走对了，表达他对新中国前途的信心，并寄希望于台湾国民党人士，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心愿。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嘱咐有关人员妥善保存，并说，李先生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性文件。

与此同时，周总理还关注更大范围内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境遇，并尽一切可能加以保护。据当时我听到的传达，1969年5

月4日,周总理在给当时国务院军代表转全国人大、政协军代表的一封信中提出: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不知是否派出?如已派,可与他们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的干部队伍,而不要去批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1970年2月,周总理又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作出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随便揪斗,如果党外人士有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如有现行反革命,另当别论。之后,他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已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人士中的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干校抽调回来。这对保护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其领导机关,制止和纠正乱批乱斗民主党派人士的状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70年三四月间,周总理几次向中央统战部军代表提出,要反映民主人士、党外朋友对重大问题的意见和情况。此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三年多的简报又得以恢复。这也是我从干校调回来工作的起因。

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件事是1970年底,农工党中央负责人黄琪翔先生因突发心脏病逝世,当时我们报告了周总理。因黄先生系全国政协委员,报告中没有提出发消息的问题。周总理审批报告时,批示要在《人民日报》上发黄先生逝世的消息。周总理这样批示,显然是既考虑到黄先生在原国民党的地位和对台湾军政人员的影响,也是针对当时情况,刻意表示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尊重。再一件事是,周总理当时曾指示统战部军代表重新研究原台盟中央负责人谢雪红的右派问题。谢雪红原系台共(台湾省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共产党组织属日本共产党领导,故称台共)成员。抗战胜利后,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曾参与领导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后在香港和一些同志创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的右派问题,在当时虽不能得到解决,但提出谢的问题,显然是周总理考虑到她是台湾省籍知名的代表人士,从有利于对台和海

外工作出发的。谢雪红的右派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改正。

1970年10月,根据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统战系统军管组起草《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的处理意见》,我参与了这项工作。这个文件1971年2月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下发。这是当时条件下第一个有关处理“文革”中查抄财物问题的政策文件。文件规定:除敌我矛盾外,查抄的爱国人士财物应一律发还;但对巨额存款冻结,留待以后再议。其后,在北京上层爱国人士中开展落实这项政策的工作。这体现了周总理对民主人士的关心和对贯彻统战政策的重视。

大约是1971年初,在一次活动中,由于工作人员对党外人士不熟悉,因而未请某位党外全国政协副主席签名,结果他的名字漏掉了。周总理知道此事后责令有关负责人向对方赔礼道歉,并指示:今后凡有党外人士参加的活动,应有统战部熟悉情况的同志到场,弄清党外人士出席的情况,不能再出差错。此后,我经常担负此项任务。由此,可看出周总理对党外人士的尊重。

197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于这年10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间,我参加《政府工作报告》中“统一战线问题”部分的起草工作。当时,我们先听了周总理重要指示的传达。指示说:这次要开四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将来也要开,现在不开。统一战线是毛主席几十年一贯的思想,现在还要注意这个问题;国际统一战线的形势很好,国内也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统战政策很不明确的情况下,周总理的这一指示,为这一部分内容的起草起了重要的作用。

9月6日晚上10点,周总理召集了一次专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的会议。会议开始后,周总理表现了他一贯的细致耐心和沉稳,在讨论草稿之前,他先是对参加会议的各方面同志表示慰问,然后一一询问,显得格外亲切、轻松。当问到我时,我回答了

自己的岁数,又问我何时参加工作的,我回答是1948年到李家庄中央城工部工作的。周总理听后引起了注意,因为我到城工部时,他还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他说:“啊!你是在李家庄呆过的,一直在统战部工作?”我答说:“是一直在统战部工作。”他说:“那很好嘛!”我立刻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老人家还记得李家庄!那是当年中央城工部也就是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周恩来同志那时经常到李家庄去,指示城工部工作,会见已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

在这次会议讨论草稿时,是按各个部分逐一议论。当研究到统一战线部分时,周总理曾关切地问到民主党派问题怎么办,随后,他就向当时陪同毛主席南巡的国务院负责同志问道:“毛主席有些什么指示?”这位负责同志当即转述了毛主席的指示:民主党派问题,现在采取一个拖字;到四届全国人大以后,过一两年“五一六”查清了,斗批改差不多了,再挂牌子,显得有秩序。周总理在听了这位负责同志的回答后,沉思了一下,接着对统一战线问题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统一战线其实最广泛,党与非党,党外帮助整党,其实不是没有话可说。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强调,气势就大了。剥削阶级只能占少数。党与非党是最大的统一战线,要强调一下,然后再说与其他阶级的。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对《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又全面进行了修改,此后对报告稿的讨论放到了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9月12日夜,总理等人正在讨论报告稿时,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不断传来北戴河林彪一伙的动态,接着报告了林彪叛党叛国外逃的消息。这就使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拖了下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特大政治事件,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它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周总理协助毛主席机警、周密、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件,清除了隐患,稳定了局势。此后,周总理得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处境有所改善,并提出了批判极“左”

思潮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恢复。

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在党内逐步传达,而如何向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传达,是周总理缜密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统战部军代表于这年11月间写出请示报告,提出方案,建议分步骤扩大传达。这年12月29日至31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由周总理主持,开始向党外上层人士进行传达,并组织座谈讨论。参加听传达和座谈的党外上层人士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以上的部分人士。其中有宋庆龄、何香凝、阿沛·阿旺晋美、傅作义、许德珩、李德全、帕巴拉·格列朗杰、华罗庚、邓初民、卢汉、史良、罗叔章、季方、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贝时璋、庄希泉、严济慈、吴有训、张謇、梁思成、茅以升、林兰英、林巧稚、童第周、竺可桢、孟继懋、赵忠尧、沙千里、丁西林、张奚若、刘文辉、王季范、杨东莼、朱蕴山、荣毅仁、刘斐等。

周总理在传达开始,首先简要讲了一段话,然后由有关负责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文件。最后,周总理就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讲话,他特别指出:林彪问题乍听起来是坏事,但再听,再看,再想,又是大好事,是最大收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在谈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时,他说,基本的就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路线清楚了,就要团结绝大多数,不仅党内如此,就是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中也要团结大多数;在正确路线下,组织问题就是团结问题。在开会期间,周总理还亲切地询问了一些民主人士的身体情况,肯定他们对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提倡大家做党的诤友。

为了帮助党外上层人士了解这一事件的有关情况 and 解释有关问题,周总理还特地邀请了李富春等10名中央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一道参加分组讨论。由于周总理细致、周密的安排,同党外人士诚恳的语重心长的讲话,从而帮助党外人士正确地了解了这一事件,统一了思想,稳定了情绪,增强了他们对党的信任和统一战线

的凝聚力。当时我亲自感受到,许多党外上层人士众口一词地衷心拥护和称赞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应当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亲自传达讲解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统一战线活动。党外上层人士对恢复统一战线的工作活动,也倍感欣慰和高兴。其后,统战部经请示周总理批准,1972年下半年在更大范围内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传达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并组织了座谈讨论。此后,在全国政协建立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学习领导小组,主要由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组成。

1972年3月,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在关押中被迫害致死。据当时我部具体处理善后的同志说,当他认领尸体时,徐冰同志面目已完全脱形,他都不敢认了,可见徐冰所受的折磨和痛苦。徐冰是周总理非常熟悉的党内负责干部,在重庆南方局时曾长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建国后因从事统战工作的关系,与周总理接触是很频繁的。当徐冰病重时,周总理指示立即送医院全力抢救,在得知徐冰的死讯后,又立即指示要告知其家属,并为此约请有关负责同志谈话,要求全面检查一次被拘留、关押、监护人员的身体情况,指示:中央精神要落实,有病的治疗,病重的住院,全面检查一下。周总理从徐冰的死,想到的是其他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民主人士。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总理为了维护党的统一战线,想到了应从各方面保护党外人士,想到了归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被查封的财物,想到了民主人士的境遇和身体,继而他想到的是尽早解放受审查的党外人士和他们的政治待遇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每年国庆节时,对参加国庆活动(包括国宴和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内党外人士,周总理都十分关注,经常借此时机,解放党内负责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国庆见报名单已成为